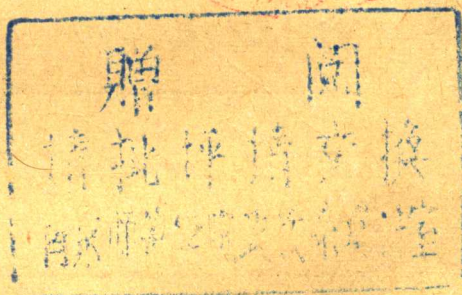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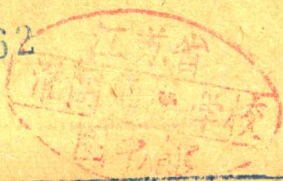


中国哲学史讲座

015362



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函授教材编写组

一九七六年五月

目 录

第一讲	先秦时期哲学上的大论战	1—15
第二讲	秦、两汉时期的哲学斗争	16—33
第三讲	魏、晋、南北朝的哲学斗争	34—46
第四讲	隋唐时期的哲学斗争	47—58
第五讲	宋元明清(鴉片战争前)时期的 哲学斗争	59—86
第六讲	近代哲学战线的斗争	87—112



淮阴师院图书馆 727936

第 一 讲

先秦时期哲学上的大论战

作为观念形态的哲学是随着阶级社会的形成而产生的。我国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就进入阶级社会。夏朝是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接着是商朝和西周，西周是奴隶制的极盛时期。殷商、西周的奴隶主，为了统治和欺骗奴隶和劳动人民，利用人们对自然力量的崇拜，编造出“天神”的唯心主义；同时也出现了怨天、骂天的反天神思想，产生了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因素的“阴阳”、“五行”、“八卦”。到了奴隶社会末期，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发展，又产生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哲学思想。这些哲学上的斗争，是奴隶社会阶级斗争在哲学上的反映。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和百家争鸣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时期，社会形态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

这个时期，奴隶社会的基本矛盾——奴隶和奴隶主的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奴隶们起义的烽火连天，其势如暴风骤雨，锐不可挡。公元前660——470年大的奴隶暴动就发生了十七起。特别是柳下跖率领的九千多起义奴隶，“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把奴隶主贵族打得落花流水，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制的基础。

这段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的矛盾激化了。春秋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所有制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和租佃关系。随之，地主阶级向奴隶主贵族展开了夺权斗争，奴隶制度处于崩溃之中。到战国时期，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基本上代替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新兴地主阶级开始了自己的全面进军。魏、韩、赵、齐、燕、楚、秦七个大国的新兴地主阶级先后夺了奴隶主贵族的权，并且通过变法逐步建立起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奴隶们要推翻奴隶制度，新兴地主阶级要发展封建制，没落奴隶主贵族妄图复辟倒退，因而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充满了前进与倒退、变革与反变革、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潮、各种学派纷纷出现，为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争夺意识形态阵地，开展大辩论，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百家争鸣中，基本上是儒法两家的对立。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除了儒家，还有以老聃、庄周为代表的道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是法家，反对儒家的，除了法家，还有墨家、兵家、名家等学派。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复辟奴隶制还是拥护封建制。在哲学上，表现为反天命和尊天命思想的对立，无神论和宗教思想的对立，并且围绕着对自然界的性质、天人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们能否认识客观世界等问题，开展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

二、法家和儒家在哲学上的大论战

儒家是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主要代表。它的祖师爷是孔

丘。孔丘继承殷、周的天神观念和礼乐制度，打着“尊天”、“法古”两面破旗，拚命鼓吹唯心论的天命论，“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今不如昔”的历史倒退论，反对变革的“中庸之道”，建立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为“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辩护。战国时期的孟轲继承了孔老二的衣钵，并把儒家哲学发展成为“天人合一”的主观唯心主义。法家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主要代表。他们举起变法革新的旗帜，坚持朴素的唯物论，宣传“天人相分”和进步的历史观，为本阶级的变革实践提供理论根据。早在春秋末期，就出现了法家的先驱人物，如邓析、少正卯等。邓析作“竹刑”，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少正卯与孔老二对着干，为新兴地主阶级夺权制造舆论。战国前期，法家的主要代表有李悝、吴起、商鞅等。商鞅为地主阶级制定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政治路线，在秦国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变法，加强了地主阶级专政，为以后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与李悝同时的西门豹，大破“河伯娶妇”的迷信，打击奴隶主统治的社会基础，在我国古代是一位享有盛名的无神论者。战国末期法家的杰出代表是荀况和他的学生韩非。荀况建立了战斗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荀况的唯物主义思想，提出进化的历史观，论证“法治”的合理性。

法家和儒家在哲学上论战的中心问题是：变革进步有理还是复辟倒退有理，主要是围绕下面几个问题开展的。

（一）反“天命”思想对尊“天命”思想的斗争

反“天命”还是尊“天命”是法家和儒家在哲学上斗争的焦点。殷、周的奴隶主曾编造“天神”的宗教唯心主义，鼓吹“以天为宗”，国王自称“天子”，借以奴役劳动人

民。孔丘为了维护和恢复奴隶制度，在哲学上竭力维护“天”的统治地位，宣扬“天命”论，说“天”是有人格、有意志的上帝，是支配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这位“天”老爷是决不可得罪的，“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一定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孔丘胡说，人的生死祸福、社会的贫富尊卑、政权的存亡兴衰，完全是由“天命”所决定，并且是无法改变的。孔丘自称是个“知天命”的圣人，说什么“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是“天命”的要求。孟轲继承了孔丘的唯心论的天命观，继续鼓吹“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胡说奴隶主最高统治者——“天子”的权力是“天与”的，复辟奴隶制的罪恶活动是“顺天”合理的，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逆天”有罪的。天命观是奴隶主贵族的精神支柱，孔孟鼓吹“天命”，是为了欺骗人民群众，反对法家的变法革新，要人们安于被奴役的地位，不能造反，不准革命。

社会变革总是革命的人们通过斗争实现的。法家要实现社会变革，改变奴隶制，就要强调“人为”的作用，把“天命”这个奴隶主贵族的保护神拉下马，所以法家反对唯心论的天命观，提出唯物论的天道观。荀况把“天”理解为自然现象，是物质的天，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自然界的变化既无意识也无目的，社会的好坏不能改变它的运行规律。荀况从“明于天人之分”出发，认为天不能主宰人间的吉凶，一切祸福都是人所自取，反对“天人合一”的唯心主义。荀况还提出“戡天”——征服自然的主张，认为人们在同自然界作斗争中不是无能为力的，能够“制天命而用之”，这种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进一步论证了旧秩序的“天”是可以反的，只要通过斗争就一定能够反

掉。韩非坚决反对天有意志的谬论，否认天命鬼神，主张崇尚人力，“乱弱者亡，治强者旺”，认为人们对国家的兴亡有积极作用。天命论是奴隶主贵族的精神支柱，法家反对天命论，理论上宣传反天有理的哲学，政治上制造变革有理的舆论，这就为地主阶级夺取政权提供了理论根据。

（二）唯物论的反映论对唯心论的天才论的斗争

法家和儒家在认识路线上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孔丘是个先验主义者，他把“天命”和人的认识联系起来，鼓吹“天才论”，胡说世界上有“生而知之”的圣人，这种“天才”人物不需要实践，不需要学习，生来便有正确认识，而奴隶们则是“困而不学”的“下愚”。孔丘叫嚷“天才”十分难得，只要靠几个“天才”就可以治理天下，他不仅自称是“天生德于予”的“天才”，而且把那些“逸民”也说成“天才”，竭力要把他们“举”出来，整顿“礼崩乐坏”的局面。孟轲认为人的知识、才能是先天就有的，是人们固有的“良知良能”，历史是由“先知先觉”的“天才”所创造的。孔孟就是这样通过制造“圣人生知”和“群氓无知”的谎言，论证奴隶主贵族永远是天生的统治者、奴隶制度应该“永恒”存在。

法家反对儒家唯心论的天才论，大力宣传唯物论的反映论，证明他们的变法革新路线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荀况认为人有认识事物的能力，而事物是可以被认识的，人们认识事物必须“缘天官”即通过感觉器官，还要通过“天君”即思维器官去进行分析和判断。“知有所合，谓之知”，认识和客观事物相符合，才是真正的知识。“知之不若行之”，更是强调了“行”在认识中的作用。这种朴素唯物论的反映论，

从认识论上论证了法家路线是从实际中来又服务于变法实际的，是对儒家天才论和天命论的有力批判。韩非进一步提出“参验”的唯物主义观点。“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主张通过事实去参照、比较，去验证认识，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据此宣布儒家的谬论是没有根据的“妄发之说”。荀、韩在批判天降人才、先知先觉等谬论的同时，主张“无能不官”，反对“以世举贤”，提出“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反对讲等级身份和举逸民，主张起用那些在变法中有作为的人们，为培养地主阶级的“贤能”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历史进化论对历史倒退论的斗争

孔丘、孟轲都是复古主义者，他们拚命鼓吹历史倒退论，反对社会变革，为开历史倒车制造反革命舆论。孔丘竭力美化奴隶制度，说西周的典章制度是“郁郁乎文哉！”对于随着封建制成长而出现的新生事物，他都一概反对，并从历史倒退论引出一条“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政治路线。孟轲又提出“法先王”的复辟口号，胡说战国不如春秋，春秋不如西周，一代不如一代。他在大肆宣扬今不如昔的同时，叫嚷要“遵先王之法”，“行先王之道”，大讲“王道”政治，把殷周奴隶主头子成汤、文王的统治说成是理想社会，妄图恢复奴隶制度。孟轲的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不过是鼓吹五百年要出现一次的历史大循环，要产生一个搞复辟的“圣人”，仍然是历史倒退论。

处于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要求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因此主张厚今薄古。法家的进步历史观就是这种社会变革的反映。荀况认为社会是不断前进的，陈旧的政治制度总是

“久而息”、“久而绝”的，必须用新的代替。针对儒家的“法先王”，荀况提出“法后王”的口号，指出“法先王”的目的是“乱世”，即对封建制度进行捣乱和破坏。韩非在论证社会进化时，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世，提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就是说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政治制度也必须相应地变革。韩非反对儒家关于古今一理的复古主义，提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讽刺效法“先王之治”、反对变革的儒家，象守株待兔一样愚蠢可笑。荀、韩的进步历史观和“法后王”的主张，是为新兴地主阶级变革实践服务的，归根到底是大讲革新有理、变法有理，痛斥复辟倒退无理。

（四）反中庸思想对中庸之道的斗争

儒家搞折中主义，鼓吹反对社会变革的中庸之道，取消斗争，否定矛盾转化。孔丘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什么是中庸呢？“夫礼所以制中也”，“中”是以礼作为标准的，“庸”就是不变化的意思，讲“中庸”无非是说周礼是永恒不变的制度，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必须局限在周礼所规定的范围之内，这就清楚地说明，“中庸之道”也就是“克己复礼”。在孔丘看来，事物之间的矛盾是必须加以消除的“祸害”，“礼之用，和为贵”，消除矛盾的办法就是折中、调和，这是一种阳险的政治欺骗，妄图用“不偏”“不易”调和当时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否定和抹煞奴隶、新兴地主阶级反对没落奴隶主的斗争。可见，孔丘鼓吹中庸之道，是用折中主义反对辩证法，目的是反对社会变革，维护行将灭亡的奴隶制度。

法家以朴素辩证法为武器，极力论证社会向前发展是事

物变化的必然趋势。韩非说：“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常即固定不变的意思）认为事物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处在生死、存亡、盛衰的变化运动之中。又说矛盾的对立面都是“与二俱行”的，例如，方与圆、长与短、粗与细、大与小、难与易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二者是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的。他在反对中庸之道的斗争中，提出“矛盾之说”，并用以观察政治斗争，认为对立的政治集团都是“不两立”、“不相容”的，指出法家和儒家是“不可两存之仇”，象“冰炭不同器”一样，相互之间在政治路线和哲学路线上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韩非不回避矛盾和对抗，申明“当今争于气力”，主张使用暴力，这是对儒家哲学中庸之道的尖锐批判，同时，为地主阶级用暴力实现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提供了哲学基础。

三、墨家、兵家、名家对儒家哲学的批判

（一）墨家对儒家哲学的批判

墨家的创始人墨翟，自称“贱人”，比较熟悉农民和手工业者，自己也会一些手工业技能，是春秋战国之际代表小生产者阶层利益的思想家，稍晚于孔丘而早于孟轲。墨家学派反儒的旗帜鲜明，是战国时期很有影响的学派。

墨家宣传“非命”思想，反对孔丘的天命论。墨翟认为“天命”是暴君编出来欺骗人民的，如果相信“寿夭贫富，安危治乱”都是命中注定的，那就会放弃人们的主观努力，这样，统治者便不努力治理国家，只是贪图享乐，胡作非为，最后必然丧失统治地位，劳动人民便不努力从事生产劳动，必然陷于饥寒。因此，主张崇尚人力，提出“强必治，

不强则乱”，“强必饱，不强则饥”。“非命”，否定有外来的神秘力量对人事的决定作用，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是对儒家命定论的有力批判。

墨翟还针对孔丘的“仁”，提出“兼爱”思想。他揭露了孔丘“仁”的老底，指出“仁”并不是什么都爱，而是有严格的等级差别的，只爱奴隶主贵族，而“小人”则被排斥在被爱之列。因此，他提出“兼爱”思想，即主张互爱互利，用无差别、无等级的爱代替儒家有差别、有等级的爱。

“兼爱”思想，对儒家的“仁”的说教起了揭露和批判的作用，就这一点来说，它在当时有其进步作用。但是这种“一切人都爱”，在阶级社会里是没有的，宣传用“兼爱”去消灭战争更是行不通的，实际上是一种阶级调和论。

墨翟反对孔丘的“生而知之”，强调知识是后天形成的。在名实关系上，他主张“取实予名”，就是要根据发展中的“实在”给予恰当的“名”。这种承认概念是客观实在的反映，是朴素唯物论的反映论，是和孔丘的唯心主义“正名”相对立的。墨翟曾经提出有名的“三表法”，认为判断真理的标准有三条：一是接受前人的经验，二是考察百姓耳闻目见的经验，三是看实效是否有利于人民。但是墨翟的认识论也有缺点，如说：“真闻莫见则必以为无”，这是经验主义的倾向；又如，听到有些人说有鬼，就得出有鬼神的结论，从而讲“天志”与“明鬼”，又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

（二）兵家对儒家哲学的批判

兵家和法家是密切联系的两家。孙武、吴起、孙臆是著名的兵家，他们主张以新兴地主阶级的统一战争去消灭奴隶主阶级分裂割据的战争，用战争推翻奴隶制，推行变法。他

们总结了新兴地主阶级战争的经验，写了专门的军事著作。从兵家的著作来看，他们的军事思想和法家大体一致，而同儒家是直接对立的。比如，针对儒家的“仁义之师”、“善战者服上刑”、“去兵去食”，提出“兵者国之大事”，主张“举兵强之”，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必须用战争解决问题，并且积极进行地主阶级的统一战争。又如，反对儒家的“以礼治军”，主张“以法治军”，指出“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认为必须建立严明的法令，执行严格的纪律，军队才能有克敌制胜的战斗能力。兵家还批评了儒家的“小国师大国”的投降主义，提出“弱生于强”，认为强和弱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够转化的，并且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弱国、小国战胜强国、大国的经验。

兵家的反儒斗争，在哲学上是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对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斗争。孙武认为，对客观情况的充分了解，是夺取战争胜利的条件，“先知者不取于鬼神”，“必取于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是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从自己方面和敌对方面的特点观察事物，包含着辩证法思想。兵家从战争经验中认识到战争的形势是不断变化的，必须灵活地运用战略战术，以便掌握胜负的决定权，他们鄙视宋襄公“不鼓不成列”的打法，反对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但是兵家看不到人民群众在推翻奴隶制战争中的决定作用，只是强调将帅的才智对战争胜负的决定作用，这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三）名家对儒家哲学的批判

名家是战国时期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的一个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惠施、公孙龙。惠施曾在魏国制订法律，主张

“信赏必罚”，可见在政治上是支持法治的。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新旧事物交替，旧的“名”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实”，出现了各种名实不符的情况。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儒家，死抱住旧的“名”不放，主张“存名正实”，通过“正名”维护奴隶制，扼杀新生事物。名家尖锐地批判了儒家“正名论”。他们认为概念应该如实反映客观事物，提出要“审其名实，慎其所谓”。就是说，“名”要随着“实”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根据新的“实”慎重地重新定“名”，这是对新兴地主阶级发展封建制的肯定。公孙龙对当时的“名实散乱”极为不满，他从实是第一性、名是第二性出发，主张“正名实以化天下”，实际上是用封建制的“实”去打破奴隶制的传统观念，这是对法家变法革新的支持。

名家思想中有朴素唯物论，惠施从千差万别的事物中抽象出“大一”和“小一”的概念。“大一”是指无边无际的宇宙，无所不包，所以没有外部；“小一”是物质的最小单位，小到不可分割，所以没有内部。不承认物质的无限可分性当然是错误的，但是，用物质最小单位构成世界的观点，观察自然界，是对儒家“天有意志”的批判。惠施还提出“天地一体”、“天与地卑”，又从哲学上批判了“天尊”、“地卑”的谬论。

名家思想中也有辩证法的因素。他们认为事物的大小、高低、长短、黑白等矛盾，失去一方，另一方也就不能存在。惠施提出“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猜测到事物在运动中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生命也包含着走向死亡的因素。公孙龙的著名辩题有“离坚白”、“白马非马”等。认为石头的“坚”和“白”两种属性是可以分离的；

“白马”和“马”，存在着特殊和一般的差别应该加以区别。后来的其他名家还提出过“镞矢之疾也，而有不行不止之时”，这里包含着相对静止的观点，是“日方中方睨”的修正补充。又如“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注意到物的无限可分性，是微分思想最原始的萌芽，也是对“小一”、“无内”的观点的否定。

名家思想中有不少消极成分，他们虽然看到了事物质的差别的相对性，但由于没有注意转化的条件，往往走到否认事物质的差异性的极端，从而陷入相对主义。他们在分析概念中，把颜色、硬度等属性看成是离开具体事物而存在的独立实体，这样一来，事物又被说成是由颜色、硬度、形状等观念所组成，从而走向唯物主义的反面。他们曾经提出过“偃兵”一类口号，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统一战争，说明他们反儒是不彻底的。

四、奴隶们对儒家哲学的批判

实践出真知，“**卑贱者最聪明**”！革命的阶级斗争是哲学智慧的主要源泉。奴隶们在同奴隶主阶级的斗争中发展了自己的哲学，并通过政治纲领和革命实践明确地表达出来。孔丘曾经一再惊呼：“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小人反中庸”！这就表明奴隶们早已拿起反天命、反中庸的批判武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中，“声名若日月”的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对孔老二这个“巧伪人”及其反动哲学的批判，在哲学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柳下跖姓展名雄，鲁西北柳下地区（今河南省濮阳县东部柳下屯）人。当时人们把光着脚板的奴隶叫做跖，所以就

把展雄称作柳下跖。他率领九千多起义奴隶，以泰山为根据地，出没于黄河中游的辽阔地区。所到之处，大小奴隶主贵族闻风丧胆，四处逃窜。这时，孔老二跑到起义军驻地，妄图诱使柳下跖放下武器，一场唇枪舌战，批得孔老二哑口无言。

柳下跖坚决驳斥了“文武之道”，批判了“法先王”的复古主义谬论。孔丘把“克己复礼”说成是符合“天命”的，向柳下跖兜售“文武之道”，以“为将军造大城数百里”、“尊将军为诸侯”等狂言作钓饵，妄图要柳下跖跟他一道“共祭祖先”，行“先王”之法。柳下跖驳斥了这种“作言造语”、“迷惑天下”的胡说，指出“文武之道”并不是“善道”，而是凭借权力“以强凌弱”的吃人之道，揭露了奴隶制的腐朽黑暗，指出这是极端不平等不合理的社会。他认为只有“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的社会，才是道德高尚的社会，表现了奴隶们不允许所谓行“先王”之道的社会继续存在下去的决心。对于“共祭祖先”，柳下跖毫无含糊地向孔丘指出，什么鬼神之事，我不懂，如果是人间的事，那我很清楚。告诉你，我们要有作人的权利：眼要看颜色，耳要听声音，咀要尝滋味，志气要得到满足。（“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这是奴隶们争取人身权利的宣言，是对奴隶主特权等级制度的有力声讨。柳下跖极端蔑视贵族们的腐朽寄生生活，痛斥“圣人”是“乱人之徒”，专门欺压人民，“乃甚可羞”，并且警告说，奴隶主的反动统治不会长久，势必“后世绝灭”，想复辟奴隶制，奴隶们决不答应。这些严词驳斥，表现了奴隶们不畏“祖先”、不法“先王”、不怕“圣人”的革命造反精神，也是对“天命论”的揭露和批判。

柳下跖驳斥了孔老二的“孝悌之道”，指出这是欺世惑众的谬论。孔丘鼓吹“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并把“孝悌”作为仁的根本，认为只有“孝子”，才能成为维护奴隶制国家的“忠臣”，可见“孝悌”完全是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主贵族统治和宗法制度的。柳下跖对这套谬论嗤之以鼻，一针见血地指出，孔丘“妄作孝悌”是想当富贵的诸侯，是为了统治人民。在他看来，被孔老二捧为“忠臣”、“贤士”的人，统统是帝王、贵族的帮凶和奴才；他们的德行，只能“为天下笑”，“皆不足贵也”。柳下跖在领导奴隶起义斗争的过程中，从奴隶阶级的利益出发，提出了与孔老二截然相反的道德标准。他认为奴隶主不劳而获，是不道德的；奴隶们夺回被奴隶主霸占的不义之财，那是最道德的。“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时，智也；分均，仁也。”就是说，在同奴隶主阶级作斗争中，舍生忘死，冲锋在前，这是勇；队伍转移时，为保卫战友的安全而退却在后，这是义；善于分析形势，掌握战机，这是智；缴获财物，公平分配，这是仁。这种对仁义智勇的全新解释，是对孔丘“孝悌之道”针锋相对的批判，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未来的利益。”

柳下跖坚持斗争哲学，讲革命道理，是非分明，打起仗来冲杀在前，批判孔丘尖锐无情，同阶级敌人决不妥协。斗争哲学的革命锋芒，在他一生的言行中始终光辉照人。直到年老临终时，还提出“死而操金锤以葬”，“下见六王五伯，将敲其头矣！”如果在地下遇见那些奴隶主贵族的头子，定将敲

碎他们的脑袋，充分表现了奴隶们决心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

×

×

×

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指出：“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回顾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从奴隶们、法家和其它进步思想家对儒家哲学的批判中，更清楚地看到哲学斗争总是和政治斗争相联系的，批判孔孟哲学，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场哲学大辩论，对促进社会变革起了重要积极作用。了解这种情况，对于当前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对于坚持开展哲学上两条路线的论战，都是很有意义的。

孔孟之道是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刘少奇、林彪都用孔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篡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林彪贩卖“天才论”，无耻地宣称他们一伙是“受于天”的先知先觉，胡说“中庸之道……合理”，鼓吹“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为他们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而今，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又步刘少奇、林彪的后尘，效法孔老二，从搞复辟倒退，大刮右倾翻案风；并且玩弄折中主义诡辩论，炮制“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路线，兜售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陈旧货色，鼓吹“相对依靠论”，叫嚷要“大胆反对”所谓“极左”，妄图用“中庸”的面纱掩盖其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面目。现实的阶级斗争告诉我们，要在思想根源上把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邓小平带头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彻底粉碎，必须继续批孔，在斗争中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